

中国 文化 考古学

张碧波 庄鸿雁◎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 文化 考古 学

张碧波
庄鸿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考古学/张碧波,庄鸿雁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7-207-09220-5

I. ①中... II. ①张... ②庄... III. ①考古文化学—研究—中国 IV. ①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842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装帧设计:张 慰

中国文化考古学

Zhongguo Wenhua Kaoguxue

张碧波 庄鸿雁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9220-5
定 价 52.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自序一 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考古学

从考古文化学到文化考古学,均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学科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和主要对象,但对考古资料的文化学研究是这一学科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特点。考古文化学“就是根据实物复原历史”,“从目的来讲,是复原历史,研究历史,方法和手段主要是类型学、层位学(或地层学)”,“挖的是死人的材料,反映的是活人的关系”,“墓地是活人埋的不是按死人的意志,是按活人的意思,反映着活着的人与人的关系”。^①

杠杠,现在还没有划,说明工作还不到一定阶段,从而提出“动态考古学”——“科学考古”的新观念,“用以发展我们的学科,用不了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兴旺起来”。^②

苏先生已经指出了中国考古学面临的局限,希望“描述的科学变成真正的科学”,所谓“描述的科学”,就是“真正讲规律的太少,还是描述为主”——按照挖掘的原样,加以描述,没有分析,没有解读,没有说明,更没有理论的说明。这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考古学科的目标:第一是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改变传统编写世界史的内容,为振兴中华,为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③

苏先生将欧洲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进一步提出考古文化学的区系类型理论,把考古类型学理论推向了新高度。

晚年苏先生提出“把(考古学)描述的科学变成真正的科学;科学是讲规律

① 苏秉琦:《关于编写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问题》,《江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② 苏秉琦:《关于学科建设的思考》,《江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③ 苏秉琦:《文化与文明》,《江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的,恰巧我们的学科还缺这一块”,应该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局限和问题,为此,苏先生急呼:“也该改换门庭了。”为此,他提出科学考古、动态考古学的命题,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的思考”,深情地表达了一位老学者对考古学科建设的关切与期待。

20多年前,在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期间,曾讨论过“关于考古资料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并有一个基本性的认识,现抄录如下:

文化史的研究必须采取学科的途径,因为文化史本身就是一门综合学科(按:文化史并不是多学科拼凑,而是它们的综合效应,是它们的总和)。它需要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民俗学、古史地学等等以及各种关系史学。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多元化、多角度、多层次的学科知识与学术观点,需要我们处理好(包括正确认识)各种学科的关系。

关于考古学文化,英国著名史学家戈登·蔡尔德说:“史前考古学造成了一场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认识革命,这场革命规模之大,可与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所取得的革命相比拟。考古学不再是靠文字记载拼拼凑凑、零零碎碎地说明可怜巴巴的五千年的状况,现在它已经能够为历史学家展现出二十五万年的景象。它像光学仪器一样,已经将我们的视力范围往回延伸了五十倍,而且每年都在扩大着用新的立场和观点来加以叙述的领域。”^①

考古学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打破了欧洲文化中心论,打破了把古代史、古代文化史仅仅当作以希腊、罗马为主体,为唯一文化策源地的统一体观念,它成了通向欧、亚、非的世界多元历史的观念的钥匙。考古学的主要成果之二是打破了中原文化中心论,给人们提供了中华文化多元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生生的历史场面。考古学的主要成果之三,也是最重要、最持久的成果,则是打破了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对文字记载的传统依赖。

考古学依赖人类物质文化的实物,从中获得文化信息,为历史学与文化史学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证据,把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带进了研究范围。它较文字历史更具体,更为多样,补充并扩大了文字历史的记载,使历史学

^① G·蔡尔德:《史前史学家对播化论的解释》,转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克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168页。



家与文化学家能够超越传统史料所限定的范围,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视野,把历史学、文化史学等学科推向了一个研究新层次。

但是,应该看到,对于文化史研究来说,考古学只提供了最基本、最主要的构筑材料,考古学的成果是文化史的史料,考古学的终点则是文化史研究的起点。因为考古学的终极目的,同样是对人类历史的一般描述,而文化史研究则需从庞杂、琐碎、重复的遗物、遗迹中,从考古文物中加以归纳、概括,而不是停留在具体的文物形态的考查上。文化史学研究应充分注意并利用考古学成果,但又不能停留在考古学文化的水平上,因为考古文化并不就是文化史,它们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有密切的关系。作为文化史,不能仅仅满足于文物的描述、年代的鉴定、族属的鉴别,甚至于不能停留在文物的类型学的整理上。以陶器纹饰为例:作为文化史研究,不应满足于陶器器型及纹饰的分类、装饰的特点,结合地层学、社会学、史学等进行说明,而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原始美学、原始思维科学、社会心理学、工艺学以及原始冶金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作综合研究。从陶系的质地、颜色、纹饰看其生活特点、生产水平以及审美观念特征,而氏族集团的地缘性、血缘性或氏族规则(如原始禁忌等等)必然一定程度地制约着陶器器型及纹饰。应该看到,文物的功能意义与人类的生物学欲求相对应,文物的符号意义则与文化所规定的欲望相对应。应在能动地、多元性地分析文物的功能时加上对文物形态方面的多层次分析,方可从具体的考古文物中看到该文物(一组或一群)所体现的文化观念。例如:山纹、波纹均为直线与曲线的演变——山纹取象于山,波纹取象于水,它们来于生活,是生活的象形。蟬纹,来于对蟬可死而复苏的认识——蟬伏土中度过幼虫期而被当成生命复苏、生命再生的象征物。涡纹为鸟纹、鱼纹的抽象化,它的连续不断、回旋不已的造型意识正是绵亘不绝的生命意识的艺术化。彩陶的外部造型的稳重深厚,色彩的明快,构图的复杂,线条的匀称,产生一种活泼生动的旋律,表现中华民族的充满生气的民族意识。

这是 20 多年前的认识,其中当有谬误与不足;但其中的确孕育了一种思考——文化史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应该有一个文化考古学,这应是文化史学的需要,也是考古学的需要。近年,学界已在这方面做出很多努力,如陆思贤的《神话

考古》、冯时的《中国天文考古学》等等。

文化考古学(包括宗教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历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的综合)是以文化学的视角审视、解读文物考古的遗迹、遗物,这些遗迹与遗物均是古代先民的心灵文本、精神世界的结晶,都蕴藏着古代先民的欢乐与悲伤、创造与智慧、期待与追求,它们是古代先民的精神文化的载体,它们揭示和反映着古代先民的大宇宙观念、小宇宙观念、天上王国观念与地下王国观念,这些文化形态、文化观念构筑着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中华文化。

文化考古学视文物考古为活的文化体,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魂的文化个体、文化群体,最终汇合为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考古学将古代历史化为活化石,从中不只可以揭示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多元文化发展规律,还可以寻求中华文明的初期文明形态、文明模式、文明特质以及中华文明发展史特征等诸问题。这就是我们提出文化考古学的初衷。



自序二 文化考古学立论要则

一、文化考古学的定义与研究范围

文化考古学作为文化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新产物,通过对考古学的相关资料的文化学研究,它包括考古资料所显示所保存的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如语言文字学、史学、宗教学、天文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文学、民族学、古史地学、神话学等等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与考察,对遗址、墓葬(还可以包括历史文献中的一些具有考察价值的问题)中的遗物做出文化内涵、文化价值、文化功能的揭示与判断,在考古文化的细化深化中,展示出其在文化遗址、文化区域以及文化史上的价值、地位与作用。这表明文化考古学主要对考古遗物作为精神文化载体,通过对能表现精神活动的物质遗存,以研究古代先民的精神世界,把这些物质遗存作为古人的心灵文本,从中揭示古人的心灵律动、生活愿景、文化追求。这是一门极具文化魅力、极具丰富内涵的科学。

我们的文化考古学以上古三代以及中国古代北方地区考古遗存为主要对象,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考古遗物作文化学的解读。

二、文化考古学的理论建设与方法建设

文化考古学是文化学与考古学结合之后的综合学科,文化考古学要借助并容纳考古区域学、类型学、地层学诸基本理论思维;同时文化考古学尽可能地吸收与融合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与西方多维文化学理论,相互融合,相互交流,形成独具人文特色、符合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考古学。综合学科需要结合理论,根据物质遗存的性质、功用,吸收适于揭示其文化性质的学科,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这要求研究者,善于学习与吸取各学科理论精华为我所用。

文化考古学应在中华文化史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探索——其基本线索、基

本特征、基本规律的认识、掌握中进行,其研究应不断增添与丰富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的内容,从而认识中华文化发展史的基本特征与基本规律,这应是文化考古学的理论建设与方法建设的基本要求。

目 录

第一章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腾画像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 兼及中印蛇文化的比较研究 (1)
- 一、中国灵蛇崇拜的文化人类学涵义 (2)
- 二、中国灵蛇崇拜所隐含的人文意蕴 (5)
- 三、从灵蛇到神龙的演化 (8)

第二章 大汶口文化三种习俗的文化考古学探索 (12)

- 一、太昊·少昊·颛顼 (12)
- 二、大汶口文化三种习俗的族属探索 (15)

第三章 红山文化的文化考古学探索 (24)

- 一、红山文化创造了红山文明模式 (24)
- 二、红山玉器——精神文明的载体 (27)

第四章 良渚文化的文化考古学解读 (32)

- 一、祝融氏与九黎 (33)
- 二、文献史料中的九黎文化 (34)
- 三、良渚文化与良渚王国 (36)
- 四、良渚玉琮透视 (44)



第五章 西王母王国文明论	(47)
一、《山海经》中西王母文本的文化解读	(47)
二、西王母与昆仑丘	(55)
三、文献学与考古学的寻绎	(58)
四、余论	(61)
第六章 青藏高原原生态文化的文化学考察	(65)
一、藏族与中华内陆各族先民共工触不周山神话的解读	(65)
二、藏族与中华内陆各族先民太阳、凤鸟崇拜的相融互渗性	(70)
三、藏族与中华内陆各族先民猕猴祖源神话的一体性	(83)
第七章 玉器文化与玉器时代	(87)
一、玉器文化分布与特征——以黑龙江流域玉器文化为例	(87)
二、中华古史上有一个玉器时代	(95)
三、玉器、神权、王权	(104)
第八章 彩陶文化的文化学说解	(112)
一、彩陶为礼器	(112)
二、彩陶纹饰图像的文化人类学解说	(115)
三、彩陶纹饰的演化	(131)
第九章 陶器纹饰的文化学试析	(134)
一、白金宝文化陶器纹饰	(136)
二、新开流文化陶器纹饰	(142)
三、黑龙江左岸新石器陶器纹饰举隅	(145)
第十章 天文考古中的大宇宙观念探索	(150)
一、唐尧的天学	(150)
二、考古史科学上透露出的宇宙观念	(154)
三、高句丽壁画墓的四神图像解析	(155)



四、墓室中的星象图	(161)
五、中外文化交融与星图经典化	(162)
第十一章 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166)
一、从玉琮纹饰到青铜图像	(166)
二、从纹饰图像中看到的商周思想、信仰体系	(170)
三、从青铜纹饰变化看商周文化之更迭	(174)
四、东西伯利亚雅库特地区青铜文化中的青铜斧	(177)
第十二章 灵性世界探秘	
——关于头骨崇拜、面具崇拜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183)
一、头骨崇拜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183)
二、面具崇拜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189)
第十三章 不死的信仰,长生的欲求	
——墓葬文化中的生死观念	(194)
一、墓葬形制文化类型举隅	(194)
二、葬式与葬礼的文化学考察	(205)
第十四章 石棺墓文化与吉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	
——以骚达沟石棺墓群及山顶大棺为代表	(236)
一、骚达沟石棺墓群	(236)
二、山顶大棺	(247)
三、石棺墓与灵石崇拜	(254)
第十五章 索离王国文明探源	
——从索离沟考古说起	(259)
一、索离沟的考古	(259)
二、学界对索离国地域的探寻	(269)
三、从东明创生神话看王国文明诸问题	(271)

第十六章 关于中国北海学史诸问题的探索

- 从白令海峡说起 (275)
- 一、从白令海峡说起 (275)
- 二、细石器文化东移 (277)
- 三、蒙古人最早发现美洲? (279)
- 四、中国古文献中的白令海峡——令正之谷 (280)
- 五、中华古族是北亚地区的开辟者与建设者 (284)
- 六、北亚人的精神文化世界 (289)
- 七、中国历代王朝的北海海疆 (298)

第十七章 五国部——一部失落的文明 (306)

- 一、五国部民族源流的探问 (306)
- 二、五国部活动区域的探查 (309)
- 三、五国部文化考论 (314)

第十八章 论秦楚丹阳、蓝田大战背后的文化冲突

- 从《楚辞·九歌》与秦《诅楚文》说起 (339)
- 一、《九歌》所显现的楚民族的文化精神 (340)
- 二、《诅楚文》所显现的秦文化观念 (342)
- 三、从《九歌》与《诅楚文》看秦楚的文化冲突 (346)

第十九章 地名、族名、国名的文化学探索 (349)

- 一、地名文化 (349)
- 二、族名文化 (362)
- 三、国名文化 (378)

第一章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腾画像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兼及中印蛇文化的比较研究

在世界古代文化史上,灵蛇崇拜、蛇文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古代中国、日本、印度均有蛇信仰、蛇文化,古代日本是蛇信仰的国家,日本神社门楣巨大的稻草绳就是纠缠交媾在一起的雄蛇和雌蛇(属绳文时代文化,弥生时代则为鹿文化)。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赐日本重仁天皇金印[此印于日本后桃园天皇天明四年(1774年)发现于九州筑前志贺岛],金印“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印作“蛇纽”,当系汉帝对日本民族崇蛇信仰之尊重。这种纠缠在一起的双蛇雕刻又见于叙利亚的阿勒颇博物馆,在一巨木上两条纠缠的蛇,竖起蛇头接吻。此文物出土于5000年前的马里遗址。古希腊圣地德尔菲有一尊三条蛇缠绕并托起圣杯的青铜柱,后被迁至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帝国时代的赛马场上。著名的雅典帕提依神庙阿克罗波利斯博物馆中有三人像,上身为入形,下身为三条蛇缠绕一起,俗称“青须”。这种纠缠的蛇形,后演化为波纹形图案,这种波纹形图案在美索不达米亚、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等古代地中海地区到处可见。^①在希腊、罗马的神话与美术中,蛇文化占据着重要内容。

中华古族认为蛇是灵物,是可以乘云雾遨游太空的神物,是永不死亡之神。

《荀子·劝学篇》:“腾蛇无足而飞。”

《尔雅·释鱼》:“腾,腾蛇。”注:“龙类也,能兴云雾而游其中。”

《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① 参考[日]安田喜宪著,王秀文译《蛇与十字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

《韩非子·难势》：“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

《淮南子·览冥训》：“……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摇……”

曹操《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则中华古人视腾蛇（腾蛇、奔蛇）为可以上天入地的不死的神物。蛇文化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世界性，自有其深广的文化内涵。

总括蛇的生活习性及其所显示的文化特性，可作如下概括：

1. 蛇为大地母神，具有神秘的灵性与超自然神力，因之被视为灵物、神物。
2. 蛇的蜕皮、冬眠春出，使其成为生命再生、永生不灭的象征，成为执掌生命再生大权的象征性存在。
3. 蛇的交媾可延续 10 小时以上，其头部外形似男根，被视为旺盛的生命力、精力与性能量的源泉。

正由于蛇文化之诸多特性，使其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国灵蛇崇拜的文化人类学涵义

在中华古文化史上，最能体现灵蛇崇拜，甚至自身化为蛇的就是伏羲、女娲两位古王者。他们二人的事迹见于古文献和石刻画像、帛画。伏羲女娲文化事迹晚出，^①应是其属苗蛮民族集团，^②这个集团与华夏族团、东夷族团交流融合稍晚，故见于中原华夏——汉文典籍亦稍晚出（典籍中之太昊伏羲氏，正是其族团文化融合的结果），殆其一见于中华典籍，即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共祖。

秦汉大一统，将前代有关伏羲女娲史迹整合为一完整的历史文化体系。

在《庄子》中所记的伏羲氏“携天地”、“袭气母”、“始为天下”，是开辟天地的古圣王；在《易系辞》中记伏羲：“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则伏羲为中华人文之始祖，中华古文化之创始人。

先秦时期，有关女娲只有零碎史料，尚未能显示她的文化面貌。秦汉大一统，促进了中华大地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伏羲女娲的文化面貌方得以全面地显露出来。

^① 孟庆利在《汉墓砖画“伏羲、女娲像”考》一文中认为：“汉画像石上的有关形象，将其附会于伏羲与女娲的说法是不对的”，而是受汉代谶纬迷信思想影响，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其阴阳人格化的寓意”。《考古》2000年第4期。汉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尾图像，其中确有日月交、天地交、阴阳交的一种文化意义，但不应因此而否定其为伏羲女娲图像。孟文的观点不足信。

^② 参考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242页。

《淮南子·览冥训》记述了伏羲女娲的事迹及其关系:在伏羲之前,先是记述“昔者黄帝治天下”,达到“道不拾遗,市不豫贾”,“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淮南子》作者认为“然犹未及伏戏氏之道也”。伏戏即伏羲,即庖羲,这里提出“伏戏之道”的命题。接下记女娲事迹:“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经过这一番整理创造,“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使世界重获新生,实现“卧倨倨,兴眊眊”,“其行溟溟,其视瞑瞑”,“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使万物各复其根”的“伏羲氏之迹,而反(复)五常之道”。从而天地之固然,万物各复其根——按宇宙自然之规律办事,使万物均恢复其本来面目,这就是“伏羲之道”,而女娲炼石补天,正是“伏羲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则女娲为组成伏羲氏历史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如果说伏羲氏是开辟天地、创造天地的人王,女娲则是整顿天地、创立天地宇宙秩序的人王。^① 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的帛书,开端即记“古大能(蛇、龙)雷戏(庖羲、做羲)”,古有伏羲为人面蛇身,又记“乃取钅迟□子之子曰女皇”,“女皇”指女娲。《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伏羲)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可知,古人视伏羲女娲为夫妻,而且他们二人“是襄天地,是各参化”——开天辟地,化育万物。汉帛书认定伏羲女娲为开天辟地之创世者,为化育万物的人文始祖,中华早期文明的创始人。

《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这是记女娲为创生之神、人类之始祖。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这应是两汉时常见的石刻画像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交尾图像的形象概括。

汉墓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像现见者有三种形式:其一为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作交尾状、手捧日月之像,如四川新津宝子山汉代石棺画像,意为伏羲为日神,女娲为月神,创造日月宇宙,调和阴阳天地。四川简阳鬼头山出土石刻画像,伏羲女娲分别手举日月,二像下方为玄武,女娲身后有一鸟,且女娲身有羽翼,有人认为精卫填海之女娃即从女娲事迹演变而来。^②

其二为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像,手执规矩以规划天地,二人身后上部有二小人握手图像。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麹氏高昌伏羲女娲帛画,伏羲女娲一男一女人首蛇身交

① 徐旭生先生早已从《淮南子·览冥训》的“语意含蓄未尽”中发现“女娲同伏戏氏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36页。

②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尾,二人手执规矩,二人头上为日,尾下为月,其身旁身下还伴有星宿图像。这副帛画说明伏羲女娲为规划天地、创造宇宙的开辟神。

“天道成规,地道成矩”。^① 规是画圆的工具。

“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②“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句,句出于矩。”^③

规与矩是古代巫者掌握天地的象征工具,用以画方画圆,圆方象征天地,“用这工具的人,便是知天知地的人。巫便是知天知地又是能通天通地的专家,所以用矩(规)的专家正是巫师”。^④ 是知伏羲、女娲是大巫师兼人王,是知天知地和通天通地的智者、圣者。这是一个涉及中华早期文明特征的问题。

其三,为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手执规矩图,在伏羲女娲二像臂下,有小儿手曳其袖,中间夹一小儿图像。^⑤ 蛇身交尾,天地交、阴阳交、日月交、男女交、雄雌构精,万物化生,生命穿过文化之网,创造人类,创造世界。伏羲女娲规划天地而且为人类始祖。

女娲补天神话又见于共工与黄帝(或曰颡项、祝融、高辛)争战历史事件中,此当是东夷族团与华夏族团发生冲突后,女娲族团融入的历史轨迹,也表明上古时期,东夷、华夏、苗蛮三大族团之融合与多元文化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综上,伏羲女娲为创世者,开辟天地、规划宇宙、掌握天数之智者、圣王,又为万物之祖,生殖之神。这种灵蛇崇拜的文化人类学涵义正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古史观。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像,这种半人半神、半人半兽的形态,正标明中国社会从野蛮世界向文明世界过渡,在过渡过程中,新世界极力挣脱旧世界的羁绊而尚未摆脱旧世界印迹的特定状态,这又是中华早期文明诞生阶段一个鲜明特点。

古印度是一崇拜灵蛇的国度,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蛇文化影响了中华敦煌文化。印度蛇(龙)文化称为 Naga(那伽),“Naga 是在雅利安文化没有进入印度平原以前的印度文化所最敬仰的图腾神形象符号”。^⑥

中国学者认为:“Naga 的意思是蛇。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佛教传入以后,‘龙’的涵义变了,佛经里以及唐代传奇文里的龙王就是梵文 Nagaraja、Nagaraja

① 杨雄:《太玄经·十玄图》。

② 《荀子·不苟篇》。

③ 《周髀算经》。

④ 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56 页。

⑤ 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画像。

⑥ [印]谭中:《再谈中国龙凤与印度 NAGACARUDA 的亲属关系》,《1990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 年版。